

陈思和 丁帆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 研究书系

咸立强 著



寻找归宿的流浪者

创造社研究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陈思和 丁帆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 研究书系

咸立强 著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寻找归宿的流浪者

创造社研究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咸立强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6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陈思和主编)

ISBN 7 - 80186 - 469 - 7

I. 寻... II. 咸... III. 创造社 - 研究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7319 号

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5 千

印 张: 19.75 插页 2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86 - 469 - 7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陈思和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由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负责策划招标、并要求我去承担。其实我当时手头正在做自己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项目,无意再去承担这么一项任务,只是碍于南京大学董健教授、丁帆教授等朋友的情面,也出于本人担任了该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而一向无所贡献的惭愧,才勉强答应与丁帆教授一起来担当这项工作。但是一沾上这个项目,就觉得是湿手遭了面粉,事情越来越麻烦。其原因之一,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资料积累不多,不足以在此基础上作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文革”结束于今差不多有三十年,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意义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每年全国有上百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走上专业岗位。但奇

怪的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成果却甚少。据范泉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所列辞目,有关文学社团的1035条,文学流派的47条,其中不少流派也是有影响的“文人群体”,也应属社团范围,如以胡风为核心的“七月—希望派”。而在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领衔编撰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里,成书出版的只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不满十种社团资料集,连语丝、新月、南国这样一些重要社团也付之阙如;在90年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曾策划一套颇有规模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分研究、资料两种,但好像也只出版了关于《新青年》和《新潮》、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弥洒社、狮吼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几种资料(包括作品集和评论集),研究方面只有一本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论著,其他似都不了了之。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工具书,除范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和贾植芳、范伯群、曾华鹏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等少数几种外,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有关文学社团的整体性研究,除了关于创造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成果较多外,大多数文学社团都缺少专门的论述研究。倒是在相关作家研究中有一些涉及社团的资料积累,如周氏兄弟的传记研究中有语丝社的资料,徐志摩、胡适的传记研究中有新月社的资料,茅盾、郑振铎的传记研究中有文学研究会的资料,陈独秀的传记研究中有《新青年》的编辑情况等;此外在有关社团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这些资料和观点大多是局部的、零星的,并不是整体、系统的社团研究。这与当前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需要显然是不相称的。其原因之二,是项目内涵的扩大,现代文学不能仅仅理解为新文学,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准确理解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既然是“中国”,就不能仅以大陆地区为限,自1895年割让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地区,在文学领域都曾经产生许多文学社团,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大小古典诗社多达三百余个,可说是每一小村落就有一个诗社,这样一种壮观的诗社现象,如果不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真是谈不上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社团史;而且,既

然“现代”指的是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文学就应该包括新文学运动以外的各种文学社团现象,如南社,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文人社团,但由于它不属于新文学,在以往研究中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学视野以外。这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做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目前确实还没有具备成熟的条件。

这样一来,我们所进行的项目课题就有必要再作论证,从实际出发,完成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作为第一步,就是逐个地对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进行资料搜集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系列个案的研究。或者说,整体上的现代文学社团史暂时无法完成,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文学社团的“史”的梳理和书写,来综合成一套内容多样、各自独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的个案史。这就是目前我们编辑这套系列研究丛书的目的。在第一辑中,有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及以施蛰存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这七个社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栎社,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余的一种高雅消遣。第二种模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模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来的一个作者阵营,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在社团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审美倾向,因此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现代文学社团的模式远不止以上四种,如以政党意识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组织,还有纯粹的演剧组织,如剧社,暂时不在本系列研究之中。我们挑选了比较重要的文学社团为主要研

研究对象,在研究其发展过程中再连带出其他一些相关小社团,如语丝社带出了莽原社、未名社和狂飙社,等等。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社团与流派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所反映的文人群体面貌并不一样。前者研究的是社团的兴衰聚散,重点在人事;后者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两者混在一起研究,结果往往是流派因素压倒社团因素,理论概括压倒作家活动。这次我们组织人力撰写社团史书系,重点在人事,这是事先就规定好的,强调社团是如何形成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处的,社团与社团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展开的,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都作为我们描述的对象,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有一位专家在审读本丛书中的一本创造社研究论著时指出:“这本著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寻绎创造社这一风格独特的文学社团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历史,体现出一种精彩而务实的社团研究学术自觉。文学社团是由人构成的,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特质和各种复杂性都与人员构成密切相关。以前的创造社研究,主要从大致的理念和情感取向着手,对于创造社的内部人员结构、权力结构常常取模糊姿态,致使许多问题只能流于语焉不详,如创造社的方向转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创造社小伙计与元老派的实际关系到底如何,这本著作从创造社人员构成及其权力构成的角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创造社研究而言的,但也说出了我们研究每一个社团所希求的努力方向。

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征,每部研究著作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这里不再一一评说。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本书系坚持从资料整理着手,在确定写作要求和体例时,曾要求每本著作控制在二十万字以内,其中三分之二篇幅为社团史内容,另三分之一篇幅选载有关社团资料和编撰大事记,但最后的成果完成时,除了文学研究会一本在字数和体例上达到了要求,其他各部著作在字数上都超过了原来规定的要求,迫于出版社的篇幅限制,我们只好将各社团的大事记都删除,以保持篇幅上的统一。这些大事记将来再找适当的机会发

表。二,目前所出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书系的第一辑,第二辑的选题,如新月社、浅草社和沉钟社、大风诗社、七月—希望派作家群体等,也都在撰写的过程中,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把这些成果再次结集发表,使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陈万雄先生的著作《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朱寿桐先生的著作《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王晓明先生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都从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上给予本书系指导性的启发,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2006年3月27日于黑水斋

前 言

风风雨雨,关于创造社研究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在现代文学社团中,创造社是被研究得最深入最细致的一个。创造社成立前,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创作就已颇受文坛注意;从1921年6月8日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告成立到1929年2月7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创造社一直是现代文坛无法回避的话题。围绕郭沫若《女神》展开的批评(如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由郁达夫《沉沦》引发的论争(如仲密(周作人)的《〈沉沦〉》等)等文学现象构成了这一时期创造社研究的热点。损(茅盾)的《“创造”给我的印象》,施蕻《〈创造〉第三期小说漫评》,章克标《〈创造〉二卷一号创作评》,钟仪《评〈创造〉季刊二卷二号》等,皆从刊物入手,则为创造社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此外,成仿吾《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今心《两个文学团体与中国文学界》、周风《六年来文艺团体兴亡一览》、王铸《创造社的重来》等,则从社团的角度描述了进行中的创造社发展的轮廓与特色。这阶段的创造社研究,多直观述评,聚焦所在,重在文学,社团研究则被笼罩在对个体作家关注的背影之中。

20世纪30年代,随着集体意识不断得到强化,社团也就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在这种氛围下,创造社研究迎来了第一个丰收期。黄人影(钱杏邨)编《郭沫若论》和《创造社论》,邹啸(赵景深)编《郁达

夫论》，贺玉波编《郁达夫论》，区梦觉编《王独清论》，李森《郭沫若评传》，素雅（李赞华）《郁达夫评传》，史秉慧《张资平评传》，谭天《胡适与郭沫若》等，汇集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批评文字。未被收集的研究文字，或文学史专著等长篇大论中的片段，有宋琴心《论创造社诗人》、沈从文《论郭沫若》、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贺玉波《中国新文艺运动及其统制政策》等。其中，从人事关系的角度，试图比较全面地把握创造社发展脉络的，是黄人影（阿英）《创造社论》。这是一部论文编辑，但并非简单的资料汇总。收入了顾凤城《创造社和中国文学运动》、王独清《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张资平《读“创造社”》、郭沫若《创造社的自我批判》、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及郭沫若《“创造十年”发端》和《“眼中钉”》，一共8篇文章。后面附有《创造社各作家略传》，对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王独清等创造社主要成员作了介绍。所选文章编排有序，富有整体感。从整体评价到内部的分期转变及人事纠葛矛盾，勾勒出社团发展的主要脉络；观点迥异的文章并置在一起，相互发见，将富有疑问的关节点呈现在读者面前，则充分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卓越识见。

大量涌现出来的创造社同人的回忆文字，留下了有关社团发展的最为丰富的史料，奠定了厚实的研究基础。在《创造十年》、《文学革命之回顾》等文章中，郭沫若以其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为创造社的言说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张资平、王独清、周全平等留下的资料在补充和丰富着这个框架的同时，又呈现了创造社存在的另一副面目。将创造社同人们的回忆文字纳入研究的范围，源于这样的判断：作为回忆，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一种是倾向于文学创作性质的，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沈复《浮生六记》，叙述的与其说是“就是如此”的曾经事实，毋宁说是经过艺术加工处理后“应该如此”的文学创作；另一种回忆不仅想要还原历史，还试图说明“为何会如此”。在一些关节性问题上，辨析源流，力求将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清理出来，带有研究考证性质。

但是,回忆的形式却赋予了它很强的主观色彩,与客观的研究叙述区别开来;至于追思怀念等,则可归入第三种回忆类型。创造社同人的回忆文字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创造十年》虽被郭沫若视为“一个珂罗茨基的自叙传”,¹但文章对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的驳斥,对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泰东图书局等关系的辨析,皆带有创造社研究的性质;王独清《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对郁达夫及出版部小伙伴们离开创造社的来龙去脉做了个人性辩证,所有这些是社团研究不可或缺的层面。

郑伯奇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撰写的《导言》,从文学思潮、创作主张及成员与社团关系,对前期创造社首次进行了全面梳理,将创造社的文学倾向定位在浪漫主义,并将其发生源归之于海外留学的影响。这些说法影响深远,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作为定论而被其他研究者所接受。后来,郑伯奇又写了《忆创造社》、《创造社后期的文学活动》、《略谈创造社的文学活动》、《20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等,一起构成了所谓的郑伯奇模式,对创造社研究的影响至为深远。在人事与文学观念的叙述方面,引用郭沫若的说法以为自己论述的张本,是郑伯奇模式展开的基点。此外,郑伯奇模式的最大贡献就是将郭沫若叙述的个人性替换成社团性。在郭沫若那里,社团同人的文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我”被建构和叙述的,而在郑伯奇那里,“我”逐渐隐退,以个人为基础的叙述让位给集体的声音。创造社研究由此逐渐走上了“经典化”的历程,核心即是将创造社定型为一个不断向着革命阵营转变的斗争群体。

经过30年代的奠基,从社团的角度讲述现代文学,成为此后一段时期新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模式。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第三章“新文学演进的轨迹”分为四节:一、文学研究会,二、创造社,三、左联的成立,四、文学界的统一阵线。²新文学演进的轨迹被归约为社团运动,创造社则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对象之一。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创造

社研究更显示出一枝独秀的趋势。1938年,离骚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上海民众出版社出版了杨殷夫著的《郭沫若传》,前者与创造社的历史基本无涉,后者谈及创造社阶段时,也没有贡献出新的材料和观点。但是它们的出版,却预示着新一轮创造社“言说”热潮的到来。动因即是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重新成为中国政局上炙手可热的人物。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做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地位。”³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50寿辰。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再次明确提出:“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⁴延安、重庆、香港各地皆举行庆祝大会,祝寿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相关纪念文章更是连篇累牍,长达半年之久。罩在郭沫若头上的光环,给逝去的创造社增添了不少色彩。已经离散了的创造社,从历史的烟尘背后重新被打捞出来,出现了一个盛谈创造社的热潮。郑学稼《创造社》、《论郭沫若》和《论张资平与郁达夫》,李鸣《创造社》,陶晶孙《创造三年》、《记创造社》和《创造社还有几个人》等,皆是这一潮流的产物;它们的出现,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对创造社的认识与接受。

临近抗日战争胜利时,郁达夫在苏门答腊遇害,这成为人们控诉日本侵略军罪恶的又一铁证。郭沫若《论郁达夫》、《再谈郁达夫》,郑伯奇《怀念郁达夫》,钟敬文《忆郁达夫先生》,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黎烈文《关于郁达夫》等,郁达夫生前好友们的纪念笔墨,在追思忆旧的同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创造社时期的相关活动。和谈论郭沫若相似,创造社也是纪念郁达夫时绕不过去的一道门槛。从抗日战争爆发直至新中国成立,郭沫若和郁达夫在文学与文化界产生的影响成为创造社研究发展的契机与内在动力。之所以这样说,乃是源于以下两个判断:首先,就是在与他们相关的文字中,或多或少地会涉及创造社时期活动;其次,就是作为支撑创造社圆鼎的柱石,郭沫若和郁达夫已经成为了某

种文化象征,一个与创造社的历史存在无法分割的名词。与20世纪30年代的奠基期相比,这个阶段出现的回忆述评文字大多出自非重要成员,他们的回忆述评为创造社研究增添了许多逸闻趣事的内容,尤其是对创造社同人个性与作用的评价,更是富有趣味。陶晶孙从解剖学角度,以眼、骨、血、肉分喻创造社同人;⁵龚冰炉则以“天真的郭沫若”、“老实人成仿吾”、“神经过敏的郁达夫”、“可爱又可憎的沈叶沉”、“共苦不同甘的许幸之”对创造社同人予以介绍,⁶这些都给后来的研究者进入创造社历史,走近创造社同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最值得关注的文字,是周毓英《记后期创造社》和史蟪《记创造社》,创造社出版部小伙计们的活动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呈现,一个被忽略了群体浮出水面。

新中国成立后,左翼文学获得正统地位,创造社研究却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历史时期。整个50年代,除了郑伯奇仍在继续的一些回忆述评文字,创造社研究的新进展主要就体现于几部新文学史的写作中。服从于新文学史重在“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⁷的总体需要,创造社研究亦转而挖掘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的性质。王瑶《新文学史稿》“文学社团”一节开篇明义,“文学的组织和一切社会结社一样,它必然带着民主斗争的政治性质;虽然它并不就等于政治组织,但仍有它一定的政治意义。”⁸建国后的中国文学传统被规定为“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⁹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也就被纳入这一轨道,被认为“也还是表现了中国的现实人生,并反抗这现实人生的。”¹⁰以反映现实人生和民主斗争的政治意义作为判断基准,在这一阶段的创造社研究中,成为主流倾向,为艺术的文学取向被摒除在外,至于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世纪末的呓语”更是不被提及;政治渗透的结果,使二分法被普遍接受,以此论证创造社革命性的逐渐增强。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直接以“前期创造社在文学主张上很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将那段辉煌的历史一笔带过,在论及创

造社的功绩时,谈到两点:“首先,创造社是以旧社会的制度的叛逆者的面貌出现于当时的社会的,直接服务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其次,创造社后期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于当时文坛有很大影响。”¹¹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在涉及创造社时,几乎通篇都在极力将创造社文学倾向纳入积极浪漫主义行列。¹²社团性的淡化,前期文学主张在革命性意义上被截取,从前后分期的对比中突出革命性的增强,成为建国后文学史叙述创造社的主流趋势。王瑶所著文学史中,列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和郑伯奇作为创造社代表人物,同时期其他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张资平则毫无例外地被剔除了,至于陶晶孙、周全平和叶灵凤等,更是踪迹全无。如朱寿桐教授所说:“面对这种讲政治路线,讲阶级斗争的历史情形,再以社团为研究格局甚至为论述单位就显得很不现实。”¹³从社团角度研究创造社自然也就成为雷区。

“文革”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及作为全国文学学科重点规划项目之一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的出版,都表明文学社团重新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聚焦的中心,并被作为重新编纂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突破口。“抓住现代文学绝大部分作者参加社团以及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纷呈的特点,写社团流派史,借以表现面的情况。”¹⁴在这种背景下,创造社研究迎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具体成员与文学社团整体的研究全面开花,直至今日,仍然方兴未艾。一如既往,创造社研究仍在文学和社团两个向度上展开。就专著而言,魏建《创造与选择——论前期创造社的文化艺术精神》、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等,成为这一时期创造社文学研究的代表。在社团研究方面,有饶鸿兢、陈颂声等编的《创造社资料》,陈敬之《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陈青生、陈永志《创造社记程》,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和宋彬玉、张傲卉《创造社16家评传》等,不断将创造社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与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研究趋势相似,文革后的创造社研究也经历了从

80年代的宏观把握向着90年代以来具体问题的考证与研究的转换。在资料的发掘与考证方面,这一时期的创造社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关于赵南公1921年日记的研究报告》中,陈福康以新发现的赵南公日记为依据,打破了《创造十年》以来的某些既定说法,澄清了成仿吾受聘泰东图书局的真实情况,确定了创造社成立的真实日期,梳理了初期创造社同人与泰东图书局的关系。在《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中,武继平以郭沫若、陶晶孙等亲手填写的入学志愿书等第一手材料,重新确认了这两位创造社同人的出生日期,通过日本情报机关留下的文件等资料,考证了“夏社”具体的成立日期及成员等。倪墨炎从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档案中,发现了三个关于查封创造社的材料。¹⁵在文学社团与成员的关系上,基本成员仍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穆木天与创造社的关系,成员之间相互的友谊及其与社团自身发展的关系,都得到了比较细致深入的梳理;向来被忽略的边缘同人逐渐赢得研究者的注意:“创造社研究中,只谈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忽略了其他一些作家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这是一个不小的缺失。这样,创造社研究就被窄化了。”¹⁶周全平、陶晶孙、柯仲平、黄药眠等开始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¹⁷通过更大范围内社团成员文学活动的研究,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包含着所有可能的成员,而不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心人物)正在被发掘出来。此外,随着大众传播研究的蓬勃兴起,创作以外的文学机制受到研究者愈来愈多的重视。在论述创造社接受日本影响关系时,除了继续探讨文学现状与思潮对创造社同人创作、福本主义对后期创造社转向的影响外,都市生活等文学以外机制在创造社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与出版的关系,更是创造社研究中又一新的亮点。刘纳《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张勇、魏建《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就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通过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过去人们对刊物与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的注意远远超过了对社团成员的注意,政治标签的拘囿使人们难以

将眼光投射于商业与生存等社团具体因素,非常丰富的文学社团活动往往被简约为少数的几个代表人物,并将其思想倾向与文学主张作为社团整体的价值取向,由一个个特殊的主体组成的富有变动性的社团群体变成了静态的研究对象。“静态化”的结果,就是社团原生态的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多向度选择的可能性、兼容并包的运作特性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掉了。所以本研究项目要打破创造社已有的研究格局,实现“去蔽化”,就需要召回社团活动的主体,不以代表性人物的活动抹杀其他成员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是将所有应该被纳入的成员皆视为平等的活动主体,在具体的社团活动中叙述他们的作用与影响,以此寻觅社团流变的细微轨迹,描摹创造社发展的“人文地图”。在这幅“人文地图”中,突显创造社内部的人事变迁,从人看社团,从社团看人,使社团成为研究的关键词。

由郭沫若开启,郑伯奇加以发展,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两个或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中,¹⁸都没有创造社出版部的位置。将创造社划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目的是为了突出后期创造社的“革命”意义;而将创造社划分为前中后三个历史阶段,标准则是以刊物作为标志,与之对应的则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心人物、以周全平为代表的创造社小伙计和以冯乃超等为代表的后期新进力量这三种势力。无论是将创造社分为两个阶段还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应的都是泰东图书局,而地位丝毫不亚于泰东图书局的创造社出版部却向来没有完整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给予研究。两分法中,小伙计和郁达夫主管时期的创造社出版部往往被抹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三分法中,创造社出版部小伙计们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而出版部却只在从属的意义上得到叙述,也就是说,人的因素虽然得到了重视,人活动的基地却被忽略了,这种忽略反过来也就模糊了创造社出版部里的小伙计及负责清理出版部的郁达夫活动的真正价值,而创造社内部的人事变换也就在革命的单向度上被简化了。一旦突破郑伯奇研究模式的羁绊,不再拘束于郭沫若的一些说法,将创造社出版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发展阶段来对待,创造社的发

展轮廓就需要重新叙述。

从1925年12月创造社出版部宣告“事实上”的成立,到1926年3月1日营业课正式营业,再到1929年2月被查封,前后历时四年之久。与三年泰东图书局时期相比,跨越四个年头的创造社出版部,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本身就已经为创造社划分出一个时期,即出版部成立之前的创造社和出版部成立后的创造社。作为一个营业实体,创造社出版部开创作家自办出版机关的先河,知识分子直接进入出版界,寻求自由发声的阵地,开辟安身立命的工作岗位,这必然要求创造社在内部的人际关系和活动组织的方式,以及面向社会的活动等做出相应的调整。由创作、编辑扩展到筹集资金、印刷出版、发行等诸多文学外的事务活动,要求文学创作以外的工作人员加入,遂使创造社成员由纯文学创作者的联盟向外扩散,成员之间也就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商人化与政治化的分歧,文学与商业和政治间的纠葛,不再仅仅表现在创造社成员个体的选择上,而是以创造社出版部人事的变化与重组等方式表现出来。

创造社出版部以集股的方式成立,各地所设筹股处也就成为日后分部所在地。北京、武汉、扬州等许多分部的建立与上海总部几乎保持了同步调。严格地说,这些分部一般只是作为创造社出版部设在各地的书刊经销处,并非创造社的分社,分部的兴衰起落,直接与书刊销售情况挂钩。相比之下,广州分部的筹建虽然较迟,却一度成为创造社中心人物会聚之所,惟一能与上海总部媲美的分部。就上海与广州两地情况而言,自出版部成立后,出版部里的人事变换也就成为创造社整个社团发展情况的晴雨表,清晰地标示出创造社的发展轨迹。特别是从1926年底开始,伴随着创造社内部新一轮的人事分化与重组,一波比一波激烈的思想冲突的全面展开,仅从上海出版部成员的变换即可见出整个社团发展的大体趋向:郁达夫的回沪之旅,揭开了广州同人归来的序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失败,则使上海出版部成为远在广州和其他革命前线的创造社同人驻足之所。从革命前线归来的创造社同人,带着还没有